

校史馆里珍藏的“七大代表证”

□ 许广亮

在中央党校校史馆展厅展出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张池明的代表证，是在2009年校史馆筹建的初期征集到的。

华中地区党的七大代表之一

张池明（1917—1997年），曾用名张赤民，开国中将，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1955年授衔的开国中将共175人，张池明等4人是年纪最小的，时年38岁。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河南新乡县酒店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11岁的张池明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任少共光山县委儿童团总队长，1931年调到少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任儿童局常委兼秘书长，1933年调任红军第二十五军军部秘书，1935年任红军第十五军团司令部作战科代科长，1937年调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原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池明从延安抗大回到前方工作。同年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司令部作战科科长，1938年调六八八团任参谋长。1942年调任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兼盐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3年调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党校二部任支部书记。他是1945年在华中地区被选为党的七大正式代表的，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突破重重封锁，渡江过海去延安

1943年初，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决定抽调一批团以上干部到延安学习。2月10日左右，张池明等一行20多人奉命从师部所在的地江苏盐阜启程，张池明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去往延安的路上，经历了日军对盐阜地区的“大扫荡”和严密的火力封锁，一路跋山涉水。在艰险困难的形势下，为了尽快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大家商量决定从海上坐船到山东再转赴延安。3月16日下午，他们乘五桅大船驶入黄



开国中将张池明

海，开始是顺风，但是半夜到了连云港以东水域时，风突然停了，船在海上搁浅了，拂晓后被敌人发现，一场恶战发生了。在激烈的战斗中，有18位同志壮烈牺牲。

在滨海军区的帮助下，他们将牺牲的18位烈士安葬在滨海区马鞍山烈士陵园（今赣榆抗日山烈士陵园）。之后，一一五师师部派部队把他们护送到津浦铁路旁边，再由铁道游击队护送到微山湖以西。1943年3月底，敌人又对冀鲁豫进行了“大扫荡”。这时，他们由便衣队护送通过了平汉铁路，冲破了“封锁沟”“封锁墙”，6月初到达太行，后由太行武工队护送通过同蒲铁路、再过汾河，从吕梁根据地到了晋西北，再由晋绥到延安。在支部书记张池明的带领下，这个支部经历了千辛万苦甚至流血牺牲，走走停停历经大半年时间，终于在9月到达了延安。

到延安后，以原支部编入党校二部，改为十二支部，在原支部基础上，加了国统区、山东、太行和中直的干部，共约30多人。均为旅团级干部，其中一部分是中央机关的女干部，张池明仍担任支部书记。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次大会共有八个代表团，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党121万名党

和政策的客观依据。为紧密地联系实际，他还邀请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来校作专题报告。

在课堂上，他不遗余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强调学习党史要与实际相结合，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1956年3月27日，他给四班和新闻一班作关于《中共党史问题解答》的报告，强调要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要读毛泽东的著作。他认为，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型的结晶体，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必须研究和熟悉毛泽东的著作，这是研究分析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问题最好的指南针。1956年7月20日，他作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党史教学和科学研究上需要注意的问题”的报告，强调讲党史应该联系实际，特别要联系当前的历史

任务和地区工作等现实问题来研究党史，反对机械的、为联系而联系的做法。

这枚“七大代表证”的由来

1979年7月，我从总后勤部司令部转业到中央党校，先后在办公厅、党史教研部、图书馆工作，2006年退休后有幸参加了校史馆的筹建工作。其中有一项重要工作是征集与校史有关的历史文献、文物等等。于是，我想到了自己曾跟随8年的老首长张池明。因为1967年至1974年，我为他做警卫和秘书工作。我知道他家里有一件珍藏多年的珍贵文物“七大代表证”，而且我很早以前就曾见到过。这个代表证很小，长9厘米、宽6厘米，紫红色细布面儿的外皮。内有代表姓名、证件编号、座位号、注意事项，并盖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的印章。

2009年9月的一天，我到张池明家里，与他的夫人刘平说明了来意。她从一个精致的盒子里拿出了代表证

说：这个代表证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年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我们走南闯北，一直把它带在身边并精心地珍藏着。我和池明同志都曾在延安学习过，他上的是中央党校，我上的是中学。我父亲刘少白（爱国民主人士，1937年由安子文、王若飞介绍入党，秘密共产党员，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在我12岁的时候就把我带到了延安，先后在延安大学中学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中学部、延安中学等学习过，对延安有着深厚的感情。她表示，中央党校建校史馆是件大好事儿，一定要支持。于是，她爽快地把代表证交给了我。就这样，我兴奋地把这枚代表证带回了中央党校，并向校领导作了汇报。校领导表示，这枚“七大代表证”珍藏了多年，来之不易、极其珍贵，是校史馆的珍贵文物。

现在摆放在中央党校校史馆展出的正是张池明的“七大代表证”。从党的七大召开到今天，已经被珍藏了77年。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离退休干部局〕

庆祝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

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他通过教育、报刊、论战等多种途径让马克思主义哲学“飞入寻常百姓家”，在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张如心宣传毛泽东思想，但是从来不把毛泽东放在全党之上，这点尤其难能可贵。针对当时有人提出的“顶峰论”观点，他进行了坚决斗争。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1958年，张如心遭到错误批判，被迫离开党校。在十年动乱中他进一步受到迫害，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但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没有向错误思想屈服，在逆境中从未动摇理想信念，仍然坚持理论研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

要载体。积极树立品牌意识，严格按照《条例》“严明政治纪律，恪守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的要求优化审稿机制，把好质量关；强化政治把关，实行政治问题一票否决；优化《领导参阅》版面；结合咨政报告主题精准化匹配报送领导等。积极拓展转化渠道。利用系统资源并加强与社科联等的合作，积极拓展报送渠道，努力提高咨政研究站位，不断扩大咨政研究社会影响力。

（作者系杭州市委党校副校长、二级教授）

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更号六一居士，北宋吉州庐陵（今江西省永丰县沙溪）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欧阳修年幼时在母亲郑氏的指导下刻苦学习，留下了“画荻教子”的佳话。他学富五车、才华横溢，不但政治才能出众，而且在文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皆有深厚造诣，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和“唐宋八大家”的主将，是公认的全才式人物。

为政德才兼备。欧阳修自幼学习刻苦，敏悟过人。天圣八年（1030年）考中进士，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西京（今河南省洛阳市）留守推官。嘉祐元年（1056年）任翰林学士、史馆编修。次年，权知（暂时主持）礼部贡举，以主考官之便，对科举进行大胆革新。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擢升枢密副使，次年升参知政事（副相），封开国公。宋英宗即位后，他又进阶金紫光禄大夫。《宋史·欧阳修列传》记载，“修论事切直”，“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修以风节自持”，言其德行操守很好。因欧阳修政治才能出众，宋仁宗也非常信任他，“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欧阳修担任过滁州、扬州等地的地方长官，处理政事宽简而且不惊扰老百姓，让当地的老百姓都感到轻松、方便。当有人问他是如何做到这样时，他回答说：把放纵百姓当成宽简，把办事粗疏说成简便，那么政事一定会荒废松弛，百姓也就要遭受损害了。我所说的宽简，是不做苛刻急迫的事，是不把事情办得复杂琐碎罢了。由于他为政勤勉而不扰民，把当地治理得井然有序，老百姓安居乐业，扬州的老百姓在他离任后，为他建造生祠来怀念他。熙宁五年（1072年），欧阳修去世，朝廷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世人赞其曰“功名事业三朝相，道德文章百世师”。

散文独具风格。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主要集中在散文和诗词两个方面。欧阳修的散文具有独特的美学风格，其表现手法主要不是体现在对事物的单纯模拟和精雕细琢上，而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绘、记叙，寄情于景。他的散文，大多具有层次分明的灵感韵味，既不失自然、简约的风格，又有委婉含蓄且情韵独至的艺术特色。正如他自己所言：“诗人之意，责之愈切，则其言愈缓。”《宋史·欧阳修列传》中说他“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如在他的散文代表作之一《醉翁亭记》中，作者采取移步换景手法，极有层次地描绘出滁州山间的朝暮变幻与四时景色。整个画面由远到近，由大到小，最后聚焦在醉翁亭上。这样就制造出一种极为浓厚的抒情氛围，使人读之即感受到作者欢愉的心情，接收到丰富的情感信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作者以“乐”为主要情感线索；“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这种乐，是乐在山水，乐在美酒，而主要是在与民同乐，情感逐步升华。一些后世的研究者认为，欧阳修的散文既继承了唐代韩愈、柳宗元散文具有载道言志的社会内容以及精练凝蓄的传统特点，同时又摒弃了险奇怪涩的通病，使之向通俗平易、自然朴实的方向发展。自明代散文家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拈出“风神”一词评论欧阳修的散文后，六一风神的美名便不胫而走，成为人们对欧阳修散文的极高赞誉。

诗词“不可一世”。欧阳修提出诗文革新主张，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人物。他毕生创作诗歌800余首，代表作有《戏答元珍》等；词200多首，代表作有《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生查子·元夕》等。他的政治诗歌敢于揭露矛盾，同情民众，痛斥昏庸的统治者，鞭挞如狼似虎的贪官污吏，深得老百姓喜爱。后世学者评价欧阳修的诗“原出昌黎，痛辞靡之作，始矫西昆体，以气格为主。故其诗敷腴，宋诗风气为之一变。最长七言古体，幽咽豪迈，不可一世”。欧阳修的词以抒情为主，感情婉转缠绵，真挚深厚，清疏隽永，令读者回味无穷，当时在词坛上与晏殊相提并论，世人并称“晏欧”。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皆是被千古咏诵的佳句。

史学成果丰硕。《宋史·欧阳修列传》记载，他“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二十四史有“正史”之称，实际为3300卷，约4700万字。其中的《新唐书》

是欧阳修与宋祁等人编纂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有225卷，其中有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这75卷皆为欧阳修主修。《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中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的史书所沿袭，影响深远。欧阳修还编纂了《新五代史》，《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7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45卷、考3卷、世家及年谱11卷、四夷附录3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53年的历史。欧阳修在编纂《新五代史》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因此内容更加翔实。它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从上面可以看出，在这两部史书中，欧阳修或参与其中，或一人独纂，篇幅占了3300卷二十四史中的147卷，这是很了不起的史学成就。

金石学开山鼻祖。《宋史·欧阳修列传》对欧阳修的金石学成就也有记载，说他喜爱古代文化并酷爱学习，凡是周代、汉朝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章残篇，他都尽量收集记录下来，仔细稽考研究它们的异同之处，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在金石文字后面，对金石文字一一加以确凿地考证，取名为《集古录》。《集古录》是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收录自周武王到五代时期金石拓本1000卷。它对历史、文学、书法等皆有评论、考订。据考证，《集古录》初步成书于宋嘉祐六年（1061年），最终定稿在嘉祐八年（1063年）。欧阳修晚年改号为六一居士，“六一”其中之一就是“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可见他对此十分看重。幸运的是《集古录》得以保存至今，它对中国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考古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籍。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说过：“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幽微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



才华横溢的欧阳修

□ 龚齐珍 甘根华